

# 回忆郭可信先生振兴中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的点点滴滴

李方华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0)

郭可信先生匆匆地走了. 他为发展中国电子显微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为率领我国科学工作者融入国际电子显微学界的不懈努力, 一直历历在目.

“文革”结束后, 百废待兴. 在电子显微学界前辈的努力下, 1980年成立了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虽是中国物理学会下的分会, 但获准对外用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的称谓, 以利国际活动, 以下简称学会). 钱临照先生担任学会第一任理事长, 两年之后, 郭可信先生接任. 早在学会成立之前, 郭先生便与电子显微学界前辈同事们商量, 做了许多实事, 不辞辛苦, 为振兴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在回顾前辈们的功绩之际, 我深感郭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提高我国电子显微学水平的一大关键是抓好国际交流, 并一直视之为己任. 那时除少数留学欧美的前辈之外, 绝大多数电子显微学工作者成长在新中国, 缺少国际交流经验, 英语听说能力差. 在郭先生任学会理事长的十余年间, 他与秘书长密切配合, 分工合作, 领导有方, 凡涉及国际交流的事他大都亲自抓, 其余工作则放手让大家做, 创建了团结、和谐、高效的工作氛围, 井井有条地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例如, 在国内定期举办学会的年会和专业研讨会, 积极组织国际学术交流, 请进来, 走出去, 为电子显微学工作者创造广泛的交流场所, 把学会办得朝气蓬勃, 成为大家学习知识、提高实验技术水平、沟通科学思想、探讨新问题的场所.

上世纪70年代, 国际上电子显微学突飞猛进, 衍射电子显微学的广泛应用和新分支学科“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崛起, 带动了电子显微镜(以下简称电镜)的大发展, 然而国内几乎处于封闭、静止状态. 1978年, 日本电子显微学者代表团一行8人访问中国, 郭先生是接待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当时按学术内容分别在不同会场组织了多场学术报告和讨论, 可是大家的英语听说能力差, 为了听众能准确理解日本学者的报告内容, 郭先生亲自担当一些报告的翻译. 1979年, 郭先生率领中国电子显微学者一行6人, 参加了日本应届的电子显微学年会, 访问了日本多所大学的知名电镜实验室和电镜研制厂家, 这是“文革”之后我国电子显微学工作者第一次走出国门. 郭先生在日本争分夺秒, 与外国学者交谈讨

论, 利用一切机会为后来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 他对振兴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的责任感和他的学术外交才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80年代, 国门大开, 尽管国外学者来访之风日盛, 但国内大多数学者难有出访机会. 除少数曾留学欧美的年长同事之外, 英语水平普遍较低. 欲加快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的发展步伐, 中青年电子显微学工作者的水平迫切需提高, 需要了解国际现状. 为此郭先生与前辈同事们筹划了与日本学者每两年一次的中日双边电子显微学研讨会, 为大家提供了开阔眼界、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 在1981年召开的第一次中日双边会上, 许多中国代表第一次用英语做报告、提问和回答问题. 郭先生坐在第一排, 全神贯注. 遇到报告人在英语表达和理解有困难时, 他既充当翻译, 又兼任讲解. 限于当时国内的条件和经验, 中国代表的幻灯片质量较差, 有些报告甚至不用幻灯片, 拿着稿子念. 用现在的眼光看, 那一次的会开得很“土”, 但是起了积极作用. 不少人就是经过一次一次的会议增长了知识, 锻炼了与外国学者交流的能力, 逐渐成长起来. 回顾每一次中日双边会议, 中国代表的学术水平、英语水平、幻灯片质量普遍地较两年前明显提高. 特别是早期的中日双边研讨会对培养我国中青年电子显微学工作者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 郭先生利用一切机会在国内组织国际会议, 例如, 1986年在日本召开第11届国际电子显微学大会之后, 在北京组织了卫星会, 邀请国际知名电子显微学家做报告, 并组织他们到国内各地的电镜实验室参观访问, 为我国电子显微学工作者创造了与国际知名学者交流的机会. 类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1988年在曼谷召开的第4届亚太电子显微学大会之后在广州组织的卫星会. 国际上发现准晶体之后, 郭先生以准晶体为主题先后在北京组织了两次国际研讨会, 以及北京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研讨班. 1990年, 为纪念学会成立10周年, 郭先生组织了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些会议后大都出版了论文集, 郭先生常亲自担任主编兼编辑. 那时相当多与会者的英语不是第一外语, 未受过科班学习, 而且缺少准备格式化文稿的经验, 论文多有拼

写、语法和格式错误。郭先生总是仔细阅读每篇论文,亲自查错改正。因为郭先生认为,文集中每一篇中国人的论文都代表着中国,不能丢脸。在郭先生担任学会理事长期间,他负责出版的论文集有十多卷,可以想象他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精力和时间。1992年,郭先生组织了在北京召开的第5届亚太电子显微学大会,为了办好会议,给中国人争光,他亲自抓好会议和论文集的每一个环节。会议开得很成功,受到国际电子显微学联合会和亚太电子显微学会领导以及国内外与会者的好评。郭先生在组织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中付出的精力和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但是第5届亚太电子显微学大会结束后郭先生被确诊患糖尿病,为了让郭先生尽快恢复健康,免再精力透支,学会的同事们出主意减免他在领导学会方面的工作量。出于对学会的深厚感情,郭先生依然关注学会的工作,并在关键时候提出意见。1996年,郭先生卸任学会理事长职务之后,我作为学会的负责人,

当遇到难题请教郭先生时,他总是中肯地提出他的见解。郭先生对工作不辞辛苦、认真负责、处处想着祖国荣誉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除了在国内组织国际学术会议,郭先生还尽力帮助大家走出去,到国外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1986在日本京都和1990在美国西雅图先后召开了第11届和第12届国际电子显微学大会,经过郭先生的努力,与两届会议的组办者商谈,为我国学者分别争取到40和60名减免注册费和住宿费的资助名额。此外,郭先生与日本学者联合在日本组织了准晶体的中日双边会,中国与会学者均受到减免注册费和住宿费的待遇。

郭先生突然扔下他热爱的事业,永远离开了这一片土地,但是他为发展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所做出的一切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 怀念郭可信先生

彭练矛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北京 100871)

2006年12月12日北京。一大早起来天看起来沉沉的,感觉是一个不太好的日子。赶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参加学生论文答辩,碰到段晓峰,告诉我郭可信先生已报病危,正送医院抢救。三心二意好不容易完成了学生的论文答辩,急忙赶到医院。坐电梯上楼,出来只见楼道里张泽、吴杏芳等人在那,简单地交流了几句,知道先生已被隔离,不能见人了。虽然见不到先生,但又不忍心就那么走开。默默地站在先生的隔离病房外面,先生的点点滴滴如一幅幅定格的但又不太清晰的照片随着阵阵酸痛一下涌了上来。

1985年美国Arizona州的Tempe小城。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这个不太出名的美国大学作为百年校庆的一部分正在召开一个影响深远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发展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初是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会议云集了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的电子显微学家。记得那时我刚刚进入Cowley所领导的美国高分辨电镜实验室。大概在会议召开的前半年,从澳大利亚来了一位著名的高分辨专家Bursill先生,带来了一些神秘的叫做准晶的材料,来到ASU后日日夜夜地奋战。后来他做了一个小规模报告。我没听得懂,但非常清楚地记得他说,他们正在和中国的郭可信教授赛跑,确定准晶体的结

构。后来高分辨会议隆重拉开了序幕,我惊喜地在会议日程中发现了北京来的郭可信教授被安排做特邀报告和主持分会。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讲这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我们一帮在ASU学习的中国学生异常兴奋,早早就安排了一个欢迎郭先生的晚会。遗憾的是后来郭先生未能参加那次盛会。记得西门继业老师当时从芝加哥赶来了,给我们介绍了国内的电镜领域特别是郭先生的工作,同时也带来了他和Crewe一块开展的关于 $0.5\text{\AA}$ 电子束斑设计的工作。记得当时Cowley对这个工作非常有兴趣,但同时也表示非常怀疑。好像当时的论点是束流大了会有很强的电子间的排斥作用,不可能形成那么小的束斑。但若束流太小,虽然可以有小束斑,但对具体材料应用又不会有太大的用处。20年过去了,现在的电子束斑的尺寸已经接近了 $0.5\text{\AA}$ ,不知Cowley若能活到现在,会不会考虑修正他的原始评价。

1987年秋天,国际晶体学大会在澳大利亚西部美丽的佩师城召开。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郭可信先生和他的3位得意弟子:王大能、秦禄昌和邹进。1984年是我在美国学习的第四个年头,按理应当毕业了。但直到国际晶体学大会前我的导师Cowley一直都没有松开。记得那年夏天,Cowley让我在美国国